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Study on Influential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f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Xu, Kun and Xu, Wenli

Anhui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November 2015

Online at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70994/>

MPRA Paper No. 70994, posted 02 May 2016 07:59 UTC

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机理分析

许坤¹；许文立²

(1.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合肥, 230601; 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¹

【主要内容】受“三期叠加”影响, 中国经济“新常态”调整可能陷入“突然停顿”或“回归均值”或“走走停停”困境, 因此稳定经济增长已成为调控中国经济最紧迫任务。本文从理论层面, 详细分析了政府消费性支出影响经济波动的税收债务机制以及非需求性机制, 揭示其作用机制与内在机理。基于这一机理, 利用中国 1978 年至 2014 年宏观经济数据, 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分析了政府消费性支出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途径的差异, 结果表明: (1) 需求波动具有顺周期特征且是产出波动的根本原因; (2) 政府消费波动不是引起产出波动的原因; (3) 我国传导政府消费波动的税收-债务机制、税率机制和财政支出制度机制失效。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制定稳定政策时应当以需求管理为主, 且必须首先理顺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保证各机制有效运行。

关键词: 政府消费性支出; 私人投资; 挤入效应; 经济波动

1. 引言与文献回顾

经历过高速或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显著的“突然停顿”和“回归均值”特征²: 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长期后(最长为新加坡 30 年平均 4% 的年增长率), 增长速度显著地下降至世界平均增长率(约为 2%), 甚至有些降至零增长率(Pritchett、Summers, 2014), 例如, 19 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二战后的亚洲国家以及 70 年代后期的部分非洲国家等均陷入“突然停顿”和“回归均值”的困境之中; 21 世纪以来的部分欧洲国家, 例如希腊、土耳其等, 也陷入“走走停停”(stop-go cycle)的困境(Acemoglu、Ucer, 2015)。在此背景下, 中国增长奇迹是否仍能持续, 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1977 年至今, 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 37 年, 年均增长率高达 9.80%; 如果以新加坡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长期年均约 4% 的增长率为基准, 那么中国高速增长则始于 1967

1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三重目标下我国货币政策优化与预期管理研究”(项目号: 11&ZD011)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通货膨胀动态特征变化、预期冲击与最优监测目标研究”(项目号: 12BJL024)的共同资助。作者简介: 许坤(1991—), 男, 湖北武汉人, 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通货膨胀、经济波动与增长; 许文立(198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及财政政策。通讯作者: 许坤, kunxu2014@126.com。

2 Pritchett、Summers(2014)认为尽管存在增长率“回归均值”特征——高速增长最终回归到世界平均增长率水平, 但“异常增长率”国家和地区(泛指超过速增长国家和地区)出现“突然停顿”的可能性比“回归均值”更大。例如, 1967-1980 年间巴西实现了 5.2% 的均增长率, 但接下来 22 年其近乎是零增长; 新加坡持续 30 年的年均 4.17%、印尼持续 29 年的年均 4.71%、泰国持续 29 年的 4.91% 的年均增长率、越南持续 21 年的 5.51% 增长率等, 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戛然而止, 最后全部回归 2% 的世界平均增长率。

年，高速增长期超过 47 年，而且预测的未来一段时间增长率均不低于 4%（IMF，2015）。尽管如此，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³还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也会如阿根廷、巴西、新加坡、韩国、印尼以及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陷入“回归均值”困境的争论（Pritchett、Summers，2014）。那么，中国该如何避免陷入“突然停顿”和“回归均值”困境之中，并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目标呢？

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OECD 国家尽管在 1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缓慢，但长期温和的增长却取得了复利式效果，使其居民能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最终成为高收入高福利国家；而增长率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在长期内却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因此其长期增长最终下降，甚至停滞并陷入困境（Pritchett、Summers，2014）。例如，20 世纪初的阿根廷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年均增长率为 2% 的丹麦，但事实上稳定于 2% 增长率的丹麦如今已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经济稳定增长的意义不仅在于避免自身陷入“回归均值”或“突然停顿”的困境之中，也在于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改善（Acemoglu，2009）。那么，引起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在哪？其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及内在机理是什么？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现有对中国经济波动根源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干春晖等，2011）、生产率冲击（邵军、徐康宁，2011）、经济制度（袁申国等，2011；张建辉、靳涛，2011）、自然冲击（陈国进等，2014）等生产性因素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预期冲击（庄子罐等，2012）、金融冲击（王国静、田国强，2014）等非生产性因素均为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而中国政府实现稳定和持续增长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冲击，并进行财政结构性改革（OECD，2012）。然而，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变革等最终决定了经济潜在产出水平而非潜在水平偏离程度。不仅如此，对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波动关系而进行的跨国经验研究表明通过逆周期财政政策抑制经济波动只在少数发达国家才有效——在发达国家，政府消费性支出为逆周期性，并且有显著的滞后性；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并且在部分国家可作为产出波动的领先指标（Bachmann、Bai，2011；Vegh、Vuletin，2012）。因此，跨国经验证据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作为稳定经济运行的手段在发达国家有显著效果，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通常是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之一。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也支持财政消费性支出引起经济波动的观点，例如黄贇琳（2005）、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饶晓辉和刘方（2014）、黄贇琳和朱保华（2015）。

就效应而言，对生产性因素和非生产性因素进行的研究均间接证实我国政府支出不是经济波动的最大影响因素（邵军、徐康宁，2011；陈国进、晁江锋、武晓利、赵向琴，2014；王国静、田国强，2014）。然而，上述研究均以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甚至在简化模型中并未将政府部门纳入分析框架之中，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易受到忽视。DSGE 模型

³ 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中国政府和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是“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暂时结果。

通常假设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外生的随机实际冲击,但它明显忽视了经济波动的内生性——即使不存在外生实际冲击,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也会引起经济波动(庄子罐等,2012)。饶晓辉、刘方等(2014)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的研究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主要通过未来税收“挤出”了消费和投资,进而导致总支出下降。然而政府消费性支出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却一直存在争论。对政府支出与消费和投资关系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扩张不仅促进了私人消费上涨(李广众,2005;杨子晖,2006),而且还提高了私人投资水平(刘溶沧、马拴友,2001)。因此,虽然政府支出对经济运行具有“两重性”——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等同时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但总体而言我国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刺激了消费和投资的上涨,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李普亮、贾卫丽,2013;吕冰洋,2014)。

上述研究仅表明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在“平均”水平上具有“挤入效应”,该效应在不同波动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则并未深入研究。因此与前期研究不同,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推进:(1)前期研究方法以均值回归分析为主,仅仅考虑了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产出波动的平均效应,而没有考虑在不同的波动水平上,该效应存在的差异,因此,本文检验了在经济波动(产出、消费、投资、税收等的波动)不同分位上,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其影响的差异。

(2)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财政消费支出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传导机制。(3)传导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本文分析的重要内容。(4)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趋势偏离百分比定义产出波动程度,并将产出波动与波动程度分别进行估算。

既然政府生产性支出是产出波动的原因之一(饶晓辉、刘方,2014),那么具有“稳定器”作用的政府消费性支出(Bachmann、Bai,2011)是否也会引起产出波动呢?如果是,其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毕竟政府决策不会将所有因素纳入其中?并且政府消费性支出是如何引起经济波动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测算了包括产出、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政府消费性支出以及净出口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性,时期为1978年至2014年。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政府消费性支出在我国也具有顺周期特征,但不存在明显的领先或滞后性;(2)政府消费性支出不是导致我国产出波动的原因(各分位数水平上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3)传导政府消费波动的税收机制、债务机制、税率机制以及政策支出分配制度等均无法有效传导政府波动(0.2至0.8分位数水平上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各机制均失效。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研究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重点阐述已有研究中波动指标选取及实证方法上有待改进之处,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三部分对我国经济运行各指标的波动程度进行测算,并分析周期特征;第四部分对政府消费性支出波动是否是产出波动的原因进行了检验;第五部分则进一步检验了传导政府消费波动的各机制是否有效发挥作用。第六部分对上述分析中主要结论及隐含的政策含义进行了总结。

2. 理论分析及假设

从理论上，包括消费传导机制、投资传导机制、税收传导机制、制度传导机制以及市场结构传导机制等均能将财政消费性支出波动传导至产出波动。

首先，从消费机制看，政府支出对消费同时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Coenen、Straub, 2005; Furceri、Sousa, 2009; Heim, 2012）：互补效应是政府支出增加能直接提高私人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在收入不变时促进私人消费水平上升；替代效应是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在产品市场上是“竞争者”，因此在产出水平一定时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意味着私人消费量的减少。

其次，从投资机制看，当利率很低时，货币需求的增加不会导致利率的变化，因此货币需求总是可以得到满足（存在大量闲置资本）；当利率很高时，增加投资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收益，因此利率的变化不会引起投资的变动。当政府支出增加引起投资需求上涨时，社会闲置资本总是可以满足新的投资需求，而利率则不会上升，进而表现为“互补作用”；当利率上升到很高的水平时，社会不存在闲置资本，新的投资推动利率上涨，私人投资因此下降，此时表现为“替代效应”（Mankiw, 1987; Garaham、Hazarika、Narasimhan, 2011; Michailat、Saez, 2015）。

再次，税收和债务也是政府消费性支出影响经济运行的传导机制之一（Aguiar、Amador、Gopinath, 2009; Barro、Redlick, 2011; Garaham、Hazarika、Narasimhan, 2011）。政府支出上涨总是意味着税收水平的提高，当收入保持一定的时候，更高的税收水平需要更高的税率，而税收中的大部分则来源于消费和投资税收，而非公共服务收入。因此当前政府支出上涨意味着当期或未来税率水平的提高：如果人们预期当期消费和投资税率的上升，则政府支出会抑制当期消费和投资，从而表现出“替代效应”；如果人们预期未来消费和投资税率的上升，则政府支出会促进当期消费和投资，从而表现出“互补效应”，税收和赤字对产出的总效应在不同经济体则存在差异（Heim, 2012）。

最后，也有研究者从非需求角度对政府消费性支出的经济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如国际信贷市场上有限的资本吸引力和制度约束（Vegh、Vuletin, 2012）、政治扭曲和不平等（Bachmann、Bai, 2010）等，制度约束不足以及政治不平等会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激励，进而影响生产和消费决策。这些政治与制度研究结果暗示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差异性会随经济发展程度而变化。

然而消费和和投资机制本身并非直接由政府支出推动的，相反只有在政府支出最终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利率等决定消费和投资的要素时才起作用（Barro、Redlick, 2011），因此消费和投资机制更多是作为税收和政府债务机制最终传导至宏观经济系统的中间过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设：

假设一：政府消费支出波动不是引起产出波动的因素。因此产出波动对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的系数回归结果在统计上应该为零。其备择假设为政府消费支出波动是引起

产出波动的因素，因此系数回归结果在统计上应该不为零。

假设二：在产出不同波动程度上，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其影响不存在差异。因此在产出波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其回归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不变，且在假设一取备择假设时回归系数保持不变。其备择假设为在产出不同波动程度上回归显著性检验结果存在差异，或在假设一不成立时回归系数具有较大变化。备择假设的经济含义是在产出不同波动程度上，政府消费波动是否影响产出波动以及影响程度不同。

假设三：税收机制、税率机制、债务机制以及政策支出分配制度等均不能传导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政府消费波动并不会导致税收波动、税率变化、债务波动以及政策支出分配制度变化等。因此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税收波动、税率、债务变化以及财政支出比例变化回归结果统计上为零。其备择假设为，上述机制中至少有一类能传导我国政府消费波动，因此政府消费波动对上述变量回归结果至少有一类显著异于零。假设三实际上也可作为对我国政府消费支出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检验。

假设四：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经济运行影响机制不存在差异。因此在税收、税率、政府债务以及财政支出分配比不同变化程度上，分位数回归显著性检验结果不变，并且在假设三取备择假设时，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变化。

3. 基本研究框架与特征事实

3.1 研究框架

为验证假设一至假设四，本文分别采用 OLS 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OLS 回归用于检验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以及其影响是推动或抑制；分位数回归用于检验在被解释变量不同水平上（不同分分位数值）解释变量对其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而且也用于对 OLS 回归结果做稳健性分析。因此假设一利用如下回归方程进行验证，

$$yv = \alpha_0 + \alpha_1 gv + \beta XY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yv 表示实际产出波动， gv 表示政府消费支出波动， XY 表示影响实际产出波动的其它外生控制变量。若政府消费支出波动是引起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假设一不成立），则系数 α_1 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否则政府消费支出不是引起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验证假设二，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回归方程设定为：

$$yv_\tau = \alpha_{0\tau} + \alpha_{1\tau} gv_\tau + \beta_\tau XY_\tau + \varepsilon_\tau \quad (2)$$

其中下标 τ 表示被解释变量 yv 的第 τ 分位数回归。若系数 $\alpha_{1\tau}$ 在不同 τ 值上显著不同，则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在产出波动不同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假设二不成立）。

$$xv = \theta_{0x} + \theta_{1x} gv + \gamma_x XX + \epsilon_x \quad (3)$$

其中 xv 表示税收、税率和政府债务等中间变量，下标 x 表示中间变量 xv 对应值， XX 表示影响 xv 的其它外生控制变量。若假设三成立，则系数 θ_1 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

$$xv_{\tau} = \theta_{0x\tau} + \theta_{1x\tau}gv_{\tau} + \gamma_{x\tau}XX_{\tau} + \epsilon_{x\tau} \quad (4)$$

若假设四成立，则回归系数 $\theta_{1x\tau}$ 在统计显著且系数估计值不同；反之，若 $\theta_{1x\tau}$ 在统计上不显著或即使统计显著但差异很小，则假设四不成立。

3.2 数据处理及说明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总产出、私人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以及净出口数据分别为按支出法核算的国民收入，样本期为 1978 年至 2014 年。依据 Lucas (1977) 和 Prescott、Kydland (1989; 1990) 等学者的定义，经济波动是实际值对其潜在水平的偏离。为了消除价格水平及价格指数选择上带来的问题，本文将经济波动进一步定义为实际值对其潜在水平的百分比偏离，

$$xv_i = \frac{(x_i - xt_i)}{xt_i} * 100\%$$

其中 xv_i 、 x_i 和 xt_i 分别表示指标 x 在第 i 期的波动值、实际值和趋势值。因此波动值的测算关键在于对趋势值的估算。现有估计潜在产出的方法包括单变量滤波法、多变量滤波法、生产函数法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Epstein、Macchiarelli, 2010; Blagrove、Carcia-Saltos、Laxton、Zhang, 2015)。首先，多变量滤波方法将潜在产出定义为无通货膨胀时的产出，但该方法忽略了供需短期均衡中价格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因此其估算的潜在产出实质上扩大了产出缺口；其次，生产函数法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产出偏离完全归结为外生随机因素冲击的结果，忽略了经济波动的内生性，因此该方法会缩小产出缺口。相比较而言，尽管以 HP 滤波为主的单变量滤波方法虽然在平滑算子设置上缺乏经济含义，但却被视为对现实经济波动最好的拟合 (Ravn、Uhlig, 2002)。而在单变量滤波中，与 HP 滤波相比，BP 滤波不仅参数选取过于随意，而且还会损失样本数 (黄毓琳、朱保华, 2009)。因此本文选择 HP 滤波方法测算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平滑算子设定为 100。在计算波动程度时，为了消除平均值中正负抵消导致的波动程度抵消情况，使不同指标间波动程度更好反应实际波动程度变动，本文使用下述过程测算波动程度：(1) 计算绝对波动值，其等于趋势偏离值对趋势值的偏离百分比，而趋势偏离值等于实际值对趋势值的差；(2) 进而计算样本期内绝对波动值的平方和及其均值；(3) 波动程度即为步骤 (2) 中均值开方后的值

$$\gamma_{xin} = \sqrt{\frac{\sum_{i=1}^{i=n} xv_i^2}{n}}$$

其中 γ_{xin} 表示指标 x 在时期 i 至时期 n 内的平均波动程度 (表 1 中数据)，即总产出波动 (YV)、私人消费波动 (PCV)、政府消费性支出波动 (GV)、固定资产投资波动 (INV)、存货投资波动 (IVV) 以及净出口波动 (NXV) 等的波动程度。为了深入分析政府消费性支出如何影响总需求波动，进而影响产出波动，本文选择平均税率 (TR)、总税收波动 (TV)、中央-地方财政收入比 (CLGR) 以及财政赤字率 (DR) 等与政府消费性支出波动、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和私人消费波动进行回归分析，从而研究波动的传导机制。样本期同样为 1978 年至 2014

年，其中平均税率替代指标为历年税收总额与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总税收波动采用上述波动测算方法进行估算，中央-地方财政收入比的替代指标为历年中央财政总收入与地方财政总收入的百分比，财政赤字率替代指标为国家财政总赤字水平与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税收总额、中央和地方财政总收支额、国民总收入等数据也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

3.3 总体波动特征

表 1 和表 2 分别列出了我国总产出、私人消费、公共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以及净出口等总量需求指标的波动特征，其中表 1 同时给出了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阶段平均波动程度，表 2 给出不同指标波动的跨期相关程度。

表 1 不同时期我国经济指标波动程度

时期	总产出	净出口	私人消费	公共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	存货投资
1978-1993	3.69	485.07	4.09	6.04	10.94	26.72
1994-2007	3.69	83.25	3.48	5.07	9.29	35.38
2008-2014	1.28	27.94	3.11	2.68	3.29	27.70
1952-1977	10.41	553.88	4.51	9.54	27.56	42.69
1978-2014	3.32	303.42	3.76	5.06	9.12	30.94

表 1 表明：（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波动程度不断下降，表现为除存货投资在全面实行市场化改革后波动程度小幅上升外，其它指标波动程度均连续下降；（2）就波动下降幅度而言，净出口变化最大（约 19.83 倍），其次为产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约 8.20 倍），波动变化最下的为私人消费和存货投资（约 1.50 倍）；（3）就波动程度而言，净出口在各时期波动幅度均最大，而消费在改革前波动最小，产出在改革后波动最小；（4）改革开放战略对稳定我国产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效果最为显著（波动程度分别由 10.41 下降至 3.32 和由 27.56 下降至 9.12），全面实施市场化改革战略对稳定我国净出口波动效果十分显著（波动程度由 485.07 下降至 83.25），对稳定产出无明显效果；（5）而金融危机冲击并未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程度上升，相反各指标波动程度均有大幅改善，其中产出、公共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下降最明显。

表 2 各指标与产出相关系数

时期	+5	+4	+3	+2	+1	0	-1	-2	-3	-4	-5
产出	-0.25	-0.39	-0.34	0.01	0.60	1.00	0.60	0.01	-0.34	-0.39	-0.25
私人消费	-0.35	-0.30	-0.16	0.12	0.40	0.58	0.44	0.30	0.06	-0.21	-0.35
公共支出	0.11	-0.14	-0.28	-0.05	0.37	0.54	0.07	-0.17	-0.17	-0.16	-0.07
固定投资	-0.12	-0.28	-0.28	0.01	0.54	0.92	0.50	-0.11	-0.45	-0.38	-0.24
存货	-0.25	-0.33	-0.30	-0.07	0.38	0.65	0.44	-0.05	-0.25	-0.23	0.04
净出口	0.06	-0.11	0.00	-0.02	-0.04	-0.01	0.03	0.25	0.40	0.38	-0.14

表 2 表明：（1）私人消费、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及净出口均为顺周期，其最大相关系数分别为 0.58、0.54、0.92、0.65 和 0.40，这与 Pritchett、Summers 等（2014）对发展中国家分析结果一致；（2）除净出口波动周期具有滞后性（约滞后三期）外，其它均

不存在明显领先或滞后特征，同期相关系数在所分析区间内均最大；（3）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产出波动相关性最强（最大相关系数约为 0.92），而净出口波动与产出波动相关性最弱（最大相关系数约为 0.40）；（4）并且所有需求指标均与产出波动正相关，这说明其均不能作为抑制产出波动的逆周期工具；（5）从周期长度来看，产出波动周期与私人消费波动周期近乎一致，且均超过 10 年，而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周期最短（约为 6 年），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于净出口投资的波动周期约为 8 年；（6）不仅如此，各指标周期均有非对称特征，其中产出波动、私人消费波动均有更长正偏离时期，而政府公共支出波动、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存货波动等则具有更长的负偏离时期。

4. 实证检验和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表 3 假设一和假设二检验结果

	OLS	RQ						
		0.2	0.3	0.4	0.5	0.6	0.7	0.8
PCV	0.402*	0.430*	0.384*	0.386*	0.403*	0.389*	0.356*	0.380*
INV	0.242*	0.218*	0.199*	0.257*	0.241*	0.243*	0.255*	0.252*
IVV	0.037*	0.039*	0.040*	0.036*	0.040*	0.040*	0.039*	0.037*
NXV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GV	0.056	0.006	0.025	0.065	0.054	0.055	0.080	0.065
R ²	0.861	0.594	0.649	0.673	0.688	0.694	0.702	0.702

注：详细回归结果见附录一，并且 OLS 回归结果报告 R²，RQ 回归结果报告 Pseudo R²；OLS 为对方程（1）进行回归，RQ 为对方程（2）在不同分位数值上进行回归；（3）“*”表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无“*”表示 5%显著性水平上不拒绝原假设。

为了检验我国政府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影响及差异性，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对其进行分析。表 3 列出了主要回归结果（详细结果见附录一），其中 OLS 为最小二乘回归结果，RQ(x)为 x 分位数上分位数回归结果。首先，在仅存在政府消费支出波动以及控制变量的情况下，OLS 回归第一列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并非为产出波动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上未拒绝系数为零的假设。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真实性，我们采用国家财政支出总额波动数据进行回归，OLS 回归第二列给出了回归结果，其表明国家财政支出在 5%显著性水平上亦不拒绝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并且系数估计值也约为零。

OLS 回归结果仅仅表明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在“平均水平”上不是产出波动的影响因素，但其不能说明在产出不同波动程度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变化，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产出不同波动水平上政府消费波动是否依然不是其影响因素。在 0.2 至 0.8 分位数水平上，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第一列）和国家财政支出波动（第二列）依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在 10%显著性水平上不拒绝零假设。虽然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系数存在差异（在 0.006 至 0.080 范围内），但国家财政支出波动系数则始终为零。这进一步说明

无论是在“平均水平”上还是在产出不同波动程度上，我国政府支出波动都不是影响我国产出波动的原因。

4.2 稳健性分析⁴

首先，我们采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波动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波动分别作为替换指标引入模型中，从而分析财政支出主体不同是否会影响上述检验结果。附录一中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列出了分析结果。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波动都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亦即在 5%显著性水平上不同层级政府支出都不是我国产出波动的根源。其次，前文指出政治和制度因素也会影响经济运行机制，因此我们通过设置时间虚拟变量对其进行检验。从我国领导人选举周期来看，每十年更替一次，因此分别设置 1992 年、2002 年和 2012 年为时间间隔；同时，由于 1994 年我国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因此也设置 1994 年为时间间隔（第五列至第八列给出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系数在上述年份前后均未出现明显改变：时间虚拟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在 5%显著性水平上不拒绝零假设。

总体而言，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并非经济波动的根源，而稳健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该结论并不因我国经济波动程度差异、财政支出主体差异、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周期推进而改变（假设一和假设二成立）。虽然在不同指标和不同回归方法下系数估计值不同，但其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我国经济波动的这一特征与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在发达国家，政府支出通常具有稳定产出的作用，因此政府支出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显著负向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通常是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因此政府支出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尽管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具有顺周期特征，但其并非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也不是经济波动的“稳定器”。前文已经指出经济系统具有多种潜在机制传导政府消费波动，然而我国政府消费波动并未有效传导至经济系统中，其隐含表明经济系统中传导政府消费波动的各机制并未有效传导政府消费支出波动。

4.3. 传导机制分析

只要传导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的各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则波动最终会传导至产出波动；尽管最终引起的产出波动存在差异，但政府消费波动引起的税收和债务变化则是迅速的。然而我国政府消费波动在统计上并非为产出波动的原因，因此需要对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对假设三和假设四进行检验的方法是，首先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以政府消费支出作为解释变量，税收波动、平均税率、财政赤字率和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对分位数回归进行稳健性分析。稳健性分析步骤为，首先利用国家财政支出波动作为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的替代指标对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利用中央财政支出波动和地方

⁴在进行稳健性分析时，本文采用国家财政支出波动（NGV）、中央财政支出波动（CGV）和地方财政支出波动（LGV）作为替代指标。为了保证可比较性，其也进行同样的处理，即利用 HP 滤波分离趋势值和偏离值，并以偏离值对趋势值的偏离百分比作为波动值。国家财政支出、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数据亦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样本范围为 1978 年至 2014 年。

财政支出波动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对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附录二列出了所有分位数回归结果，其中 $RQ(x)$ 表示在 x 分位数水平上进行回归分析和稳健性分析； $RQ(x)$ 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对税收波动（左上）、平均税率（右上）、财政赤字率（左下）和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右下）回归结果；各类回归结果中第一列以政府消费支出波动为解释变量基准分析，第二列至第四列分别为以国家财政支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波动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的稳健性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无论我国经济波动程度高低，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并未对政府支出、税率、赤字率已经分税制体制造成显著冲击，因此支持有关税收和债务机制以及财政制度的原假设（假设三和假设四成立）⁵。就税收波动而言，附录二中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税收波动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均未通过 5% 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税收不同波动程度上政府消费支出波动不是其影响因素。从稳健性分析结果来看，首先我们利用国家财政支出波动（ NGV ）作为替代指标对税收波动进行回归，结果亦显示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国家财政支出波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次，从不同财政支出主体来看，利用中央财政支出波动和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值分别对税收波动进行回归，不同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均不是影响我国税收波动的原因，并且回归系数⁶在 -0.005 至 0.003 间变动，系数绝对值 and 变化范围均非常小。就政府债务而言，附录二中政府消费波动对财政赤字率的回归结果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估计值⁷在 -0.013 至 0.010 范围内变动，表明在财政赤字率不同波动程度上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不是财政赤字率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利用国家财政支出波动作为替代指标，以及利用中央财政支出波动和地方财政支出波动作为指标进行的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虽然回归系数会出现小幅波动，但显著性结果均为改变。就财政制度（税率制度和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制度）而言，以平均税率衡量的我国税收制度和以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衡量的财政支出制度均不受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的影响。虽然在不同发展时期我国平均税率和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不断变化（平均税率变化范围为 0.000 至 0.005，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变化范围为 -0.001 至 0.001）⁸，但在其不同变化程度上政府消费支出波动对其回归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利用相同稳健性分析方法和步骤进行的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国家财政支出波动、中央财政支出波动和地方财政支出波动作为替代指标并未影响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上述回归中存在不同类型异常值，但从总体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在四类回归中（24 次回归）异常值均仅出现一次，因此并不影响总体稳健性分析结论。

5 我们认为政府消费波动与税收波动无关的可能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融资方式并不仅限于税收，而且还包括货币发行等，因此该结果也表明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增加更可能是通过增发货币进行融资。其次，从政府消费来看，其波动并未引起税收、税率、债务等的波动也可能表明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并未完全转化为居民收入和投资，财政支出效率不足。

6 存在异常值， $RQ(0.4)$ 中央财政支出波动对税收波动回归结果为 -2.139，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7 存在异常值， $RQ(0.2)$ 中央财政支出波动对税收波动回归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

8 存在异常值， $RQ(0.2)$ 中国国家财政支出波动对平均税率回归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

5. 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中国经济虽然进入“新常态”，但不会改变基本波动特征，即经济运行依然较为稳定，需求和供给对潜在水平的偏离越来越小。经济稳定运行对降低当代人福利损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目标意义重大。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波动被视为经济波动根源，但也被诸多国际组织推荐为稳定工具。鉴于这一事实，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波动与产出波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为此，我们首先检验了政府消费波动与产出波动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深入分析了产出不同波动程度上该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变化。其次我们对传导政府消费支出波动的各类机制进行了检验，并深入分析了在不同波动程度上各传导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首先就我国经济波动的基本特征而言，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我国经济运行不断趋于稳定，而且是产出、消费、投资各领域的全面稳定。其次就政府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及其机制而言，第一，我国需求波动具有顺周期特征，其是引起产出波动的最主要原因，而投资波动则是需求波动的主要成分。因此政府平抑经济波动关键在于稳定国内需求，稳定政策应主要针对投资需求，而非政府消费。第二，无论产出波动程度如何，政府消费波动均不是产出波动原因，因此在当前经济运行机制下通过政府消费稳定经济运行无效，财政政策无论是作为稳定经济增长还是波动的工具均未发挥作用。第三，我国政府消费波动无法通过当前财政体系传导波动，亦即无论是税收、税率、政府债务还是财政支出体制等均无法有效传导政府消费波动。因此我国政府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稳定器”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类财政传导机制受阻。进而为了发挥财政政策“稳定器”的作用，首先应理顺我国财政传导机制。

从财政平衡方程看，政府支出变化会造成税收或债务变化：如果通过当期一次性税收进行融资，则政府支出波动显著影响同期税收波动；如果通过未来税收融资，则政府支出波动显著影响同期债务波动；如果在各期分担融资，则政府支出波动显著影响税收波动和债务波动。然而本文研究结果均不支持上述理论观点，因此后续研究应该深入对政府支出波动的财政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即传导机制受阻的根源是什么，从而最终为财政体制改革，更好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提供有益支持。

参考文献

- [1] Preitchett, Lant., Summers, Lawrence H..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2014.
- [2] Acemoglu, Daron., Ucer, Murat. The Ups and Downs of Turkish Growth, 2002–2015.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608, 2015
- [3] IMF. Slower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a Gradual Pickup in Advanced Economies.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5/7/9.
- [4] Acemoglu, Daron. Introd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5] Liu Zheng. Is China's Growth Miracle Ov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Letter, 2015–26.
- [6]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 2011 (5), 4–16.
- [7] 邵军、徐康宁. 转型时期经济波动对我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 经济研究, 2011(12), 97–109.
- [8] 袁申国、陈平、刘兰凤. 汇率制度、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 2011 (1), 57–70.
- [9] 张建辉、靳涛. 中国转型式制度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改革开放 30 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动态, 2011 (8), 63–69.
- [10] 陈国进、晁江锋、武晓利、赵向琴. 罕见灾难风险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 2014 (8), 54–65.
- [11] 庄子罐、崔小勇、龚六堂、邹恒甫. 预期与经济波动——预期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吗?. 经济研究, 2012 (6), 46–58.
- [12] 王国静、田国强. 金融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 2014 (3), 20–33.
- [13] OECD. Looking to 2060: Long-term Global Growth Prospects.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s, NO. 3, 2012.
- [14] Bachmann, Ruediger., Bai, Jinhui.. Public Consumption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230, 2011.
- [15] Vegh, Carlos A., Vuletin, Guillermo.. How Is Tax Policy Conducted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753, 2012.
- [16] 黄贇琳.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分 R B C 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 2005 (6), 27–39.
- [17] 胡永刚、郭长林. 财政政策规则、预期与居民消费——基于经济波动的视角. 经济研究, 2013 (3), 96–106.
- [18] 饶晓辉、刘方.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 2014 (11), 17–30.
- [19] 黄贇琳、朱保华.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经济研究, 2015 (3), 4–17.
- [20] 李广众.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 替代还是互补. 世界经济, 2005 (5), 38–45.
- [21] 杨子晖.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 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 世界经济, 2006 (8), 37–46.
- [22] 刘溶沧、马拴友. 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挤出效应. 经济研究, 2001 (2), 13–19.
- [23] 李普亮、贾卫丽. 税收负担挤出了居民消费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 2013 (6), 94–104.
- [24] 吕冰洋. 从市场扭曲看政府扩张: 基于财政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12), 81–101.
- [25] Coenen Gunter, Straub Roland. Does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ed in Private Consumption?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uro Area.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 513, 2005.
- [26] Furceri Davide., Sousa, Ricardo M..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
- The Private Sector: Crowding-Out VS Crowding-In Effects. NIPE working paper, wp6, 2009.
- [27] Heim John J.. The Different Crowd Out Effects Of Tax Cut and Spending Deficits. *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2, 12(2), 105-122.
- [28] Mankiw, Gregory N.. Government Purchases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2), 407-419.
- [29] Graham, John R., Hazarika Sonali, Narasimhan Krishnamoorthy. Corporate Governance, Debt, and Investment Polic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11, 57, 2083-2100.
- [30] Michailat, Pascal., Saez, Emmanuel.. The Optimal Use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for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21322, 2015.
- [31] Aguiar Mark, Amador Manuel, Gopinath Gita. Investment Cycles and Sovereign Debt Overha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9, 76(1), 1-31.
- [32] Barro, Robert J., Redlick, Charles J.. Macroeconomic Effects from Government Purchases and Tax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26(1), 51-102.
- [33] Aguiar Mark, Gopinath Gita. Defaultable Debt, Interest Rate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69(1), 64-83.
- [34] Bachmann, Ruediger., Bai, Jinhui.. Government Purchas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16247, 2010.
- [35] Lucas, Robert E., Jr. Understanding business cycles. Amsterdam: Karl Brunner and Allan H. Meltzer,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77, 5, 7-29.
- [36] Kydland, Finn E., Prescott, Edward C.. Cyclical Movements of The Labor Input and Its Real Wag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working paper, NO.413, 1989.
- [37] Kydland, Finn E., Prescott, Edward C.. Business Cycles: Real Facts and Monetary Myt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1990, 14(2), 3-18.
- [38] Epstein Natan, Macchiarelli Corrado. Estimating Poland' s Potential Output: 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IMF working paper, wp/10/15, 2010.
- [39] Blagrove Patrick, Garcia-Saltos Roberto, Laxton Douglas, Zhang Fan. A Simple Multivariate Filter for Estimating Potential Output. IMF working paper, wp/15/79, 2015.
- [40] Ravn, Morten O., Uhlig Harald. On Adjusting the Hodrick-Prescott 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 84(2), 371-376.
- [41] 黄贇琳、朱保华.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事实的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 2009 (7), 27-40.

附录一：政府消费对经济波动影响及稳健性回归结果

OLS								
	(1)	(2)	(3)	(4)	(5)	(6)	(7)	(8)
PCV	0.402*	0.421*	0.413*	0.422*	0.400*	0.396*	0.364*	0.397*
INV	0.242*	0.253*	0.252*	0.253*	0.243*	0.248*	0.245*	0.243*
IVV	0.037*	0.034*	0.034*	0.034*	0.037*	0.038*	0.035*	0.037*
NXV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GV	0.056				0.043	0.033	0.023	0.055
NGV		0.000						
CGV			0.000					
LGV				0.000				
I92					0.029			
I94						0.050		
I02							0.215	
I12								0.090
R ²	0.861	0.855	0.855	0.856	0.861	0.862	0.873	0.861
RQ (0.2)								
PCV	0.430*	0.433*	0.394*	0.430*	0.438*	0.488*	0.433*	0.467*
INV	0.218*	0.222*	0.224*	0.222*	0.211*	0.285*	0.273*	0.261*
IVV	0.039*	0.039*	0.045*	0.040*	0.038*	0.044*	0.046**	0.042**
NXV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0.002
GV	0.006				0.015	-0.062	-0.055	-0.038
NGV		0.000						
CGV			0.001					
LGV				0.000				
I92					0.096			
I94						0.309		
I02							0.450**	
I12								0.459
Pseudo R ²	0.594	0.594	0.609	0.596	0.595	0.606	0.648	0.613
RQ (0.3)								
PCV	0.384*	0.377*	0.373*	0.377*	0.364*	0.359*	0.359*	0.384*
INV	0.199*	0.215*	0.215*	0.215*	0.230*	0.237*	0.237*	0.199*
IVV	0.040*	0.040*	0.041*	0.040*	0.042*	0.043*	0.043*	0.040*
NXV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GV	0.025				-0.019	-0.029	-0.029	0.025
NGV		0.000						
CGV			0.001					
LGV				0.000				
I92					0.142			
I94						0.160		
I02							0.249	
I12								0.223

Pseudo R ²	0. 649	0. 649	0. 660	0. 648	0. 653	0. 658	0. 669	0. 661
RQ (0. 4)								
PCV	0. 386*	0. 376*	0. 378*	0. 380*	0. 376*	0. 376*	0. 363*	0. 367*
INV	0. 257*	0. 258*	0. 257*	0. 257*	0. 257*	0. 257*	0. 227*	0. 230*
IVV	0. 036*	0. 037*	0. 038*	0. 038*	0. 036*	0. 036*	0. 039*	0. 038*
NXV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GV	0. 065				0. 026	0. 026	0. 037	0. 064
NGV		0. 000						
CGV			0. 001					
LGV				0. 000				
I92					0. 043			
I94						0. 043		
I02							0. 124	
I12								0. 081
Pseudo R ²	0. 673	0. 667	0. 673	0. 667	0. 674	0. 675	0. 678	0. 675
RQ (0. 5)								
PCV	0. 403*	0. 382*	0. 385*	0. 382*	0. 403*	0. 402*	0. 402*	0. 403*
INV	0. 241*	0. 242*	0. 242*	0. 242*	0. 240*	0. 240*	0. 240*	0. 241*
IVV	0. 040*	0. 035*	0. 039*	0. 035*	0. 040*	0. 040*	0. 040*	0. 040*
NXV	0. 001	0. 001	0. 000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GV	0. 054				0. 046	0. 046	0. 050	0. 054
NGV		0. 000						
CGV			0. 001					
LGV				0. 000				
I92					0. 008			
I94						0. 008		
I02							0. 011	
I12								0. 000
Pseudo R ²	0. 688	0. 670	0. 684	0. 671	0. 688	0. 688	0. 688	0. 688
RQ (0. 6)								
PCV	0. 389*	0. 424*	0. 388*	0. 423*	0. 396*	0. 401*	0. 389*	0. 389*
INV	0. 243*	0. 247*	0. 239*	0. 247*	0. 241*	0. 240*	0. 243*	0. 243*
IVV	0. 040*	0. 036*	0. 038*	0. 036*	0. 034*	0. 034*	0. 040*	0. 040*
NXV	0. 001	0. 000	0. 000	0. 000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GV	0. 055				0. 094	0. 092	0. 055	0. 055
NGV		0. 000						
CGV			0. 001					
LGV				0. 000				
I92					-0. 071			
I94						-0. 069		
I02							0. 016	
I12								-0. 010
Pseudo R ²	0. 694	0. 684	0. 685	0. 684	0. 696	0. 695	0. 694	0. 694
RQ (0. 7)								

PCV	0.356*	0.401*	0.386*	0.390*	0.360*	0.360*	0.408*	0.381*
INV	0.255*	0.255*	0.248*	0.260*	0.259*	0.259*	0.265*	0.253*
IVV	0.039*	0.028*	0.030*	0.028*	0.038*	0.038*	0.038*	0.038*
NXV	0.001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GV	0.080				0.074	0.074	0.078	0.066
NGV		0.000						
CGV			-0.001					
LGV				0.000				
I92					-0.033			
I94						-0.033		
I02							-0.109	
I12								-0.105
Pseudo R ²	0.702	0.703	0.695	0.703	0.706	0.705	0.706	0.707
RQ (0.8)								
PCV	0.380*	0.434*	0.407*	0.393*	0.353*	0.353*	0.390*	0.404*
INV	0.252*	0.258*	0.244*	0.261*	0.242*	0.242*	0.256*	0.251*
IVV	0.037*	0.033*	0.032*	0.026*	0.025	0.025	0.030*	0.037*
NXV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GV	0.065				0.014	0.014	0.024	0.054
NGV		0.000						
CGV			-0.001					
LGV				0.000				
I92					-0.030			
I94						-0.030		
I02							-0.124	
I12								-0.180
Pseudo R ²	0.702	0.717	0.718	0.715	0.704	0.704	0.707	0.709

注：表中“*”表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无“*”表示 5%显著性水平上不拒绝原假设。OLS 回归中，PCV、INV、IVV、NXV、GV 等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 VIF 值均小于 3，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附录二：政府消费对财政因素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

RQ (0.2)	税收波动				平均税率			
GV	0.733				0.049			
NGV	0.001				0.000**			
CGV	0.003				0.004			
LGV	0.002				-0.001			
Pseudo-R ²	0.026	0.090	0.018	0.092	0.004	0.126	0.086	0.162
	财政赤字率				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			
GV	-0.542				0.013			
NGV	0.000				0.000			
CGV	-0.007**				0.000			
LGV	0.000				0.000			
Pseudo-R ²	0.153	0.001	0.128	0.003	0.012	0.029	0.003	0.032
RQ (0.3)	税收波动				平均税率			
GV	0.856				-0.027			
NGV	0.001				0.000			
CGV	0.010				0.004			
LGV	0.001				-0.001			
Pseudo-R ²	0.051	0.131	0.017	0.131	0.003	0.097	0.052	0.125
	财政赤字率				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			
GV	-0.404				0.011			
NGV	0.000				0.000			
CGV	-0.003				-0.001			
LGV	0.000				0.000			
Pseudo-R ²	0.077	0.006	0.057	0.005	0.025	0.039	0.015	0.040
RQ (0.4)	税收波动				平均税率			
GV	0.546				-0.039			
NGV	0.002				0.000			
CGV	-2.139				0.005			
LGV	0.002				0.000			
Pseudo-R ²	0.033	0.110	0.005	0.118	0.011	0.079	0.029	0.094
	财政赤字率				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			
GV	-0.153				-0.001			
NGV	0.000				0.000			
CGV	-0.003				0.000			
LGV	0.000				0.000			
Pseudo-R ²	0.018	0.010	0.037	0.008	0.006	0.037	0.035	0.034
RQ (0.5)	税收波动				平均税率			
GV	0.217				0.061			
NGV	0.001				0.000			
CGV	-0.002				0.000			
LGV	0.001				0.000			
Pseudo-R ²	0.003	0.078	0.012	0.084	0.036	0.041	0.000	0.049
	财政赤字率				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			

GV	-0.031				-0.016				
NGV		0.000				0.000			
CGV			-0.003				0.000		
LGV				0.000					0.000
Pseudo-R ²	0.002	0.028	0.022	0.025	0.037	0.055	0.026	0.052	
RQ (0.6)	税收波动				平均税率				
GV	-0.193				0.136				
NGV		0.001				0.000			
CGV			-0.005				0.001		
LGV				0.001					0.000
Pseudo-R ²	0.001	0.057	0.014	0.064	0.002	0.008	0.006	0.010	
	财政赤字率				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				
GV	0.003				-0.022				
NGV		0.000				0.000			
CGV			-0.001				0.000		
LGV				0.000					0.000
Pseudo-R ²	0.000	0.046	0.011	0.045	0.035	0.085	0.005	0.087	
RQ (0.7)	税收波动				平均税率				
GV	-0.542				0.400				
NGV		0.002				0.000			
CGV			-0.013				0.001		
LGV				0.003					0.000
Pseudo-R ²	0.010	0.076	0.029	0.087	0.097	0.026	0.030	0.022	
	财政赤字率				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				
GV	0.075				-0.004				
NGV		0.000				0.000			
CGV			-0.001				0.000		
LGV				0.000					0.000
Pseudo-R ²	0.012	0.069	0.003	0.066	0.009	0.089	0.000	0.087	
RQ (0.8)	税收波动				平均税率				
GV	0.080				0.375				
NGV		0.003				0.000			
CGV			0.001				0.001		
LGV				0.003					0.000
Pseudo-R ²	0.001	0.073	0.001	0.071	0.181	0.081	0.028	0.080	
	财政赤字率				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				
GV	-0.059				-0.005				
NGV		-0.001				0.000			
CGV			0.002				0.000		
LGV				-0.001					0.000
Pseudo-R ²	0.004	0.099	0.002	0.087	0.012	0.064	0.002	0.068	

注：RQ (x) 代表在分位数 x 水平上进行回归；表中 “*” 表示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表示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无 “*” 表示 5% 显著性水平上不拒绝原假设。

Study on Influential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f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Xu Kun¹; Xu Wen-li²

(1. Economics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severe economic state inner- and outer-China, there is possibility that Adjustment of “new normal state” of Chines economy go ahead to “Sudden Cease”, “Back to Mean” and “Stop-Go Cycle”. Stabilizing economic growth, hence, has been the urgent task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stable of growth in the long-run exerts persistent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The paper from the theoretic perspective analyzes potential mechanisms transiting the fluctuation from government consumption such as taxation and debt mechanism, uncovering operation function and inner mechanisms as well. Accordingly, the difference of mechanisms between fluctua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of economy, by employing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applying on macroeconomic data from 1978 to 2014.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aggregate demand fluctuation is with pro-cycle feature and the main root of output volatility; public spending fluctuation is not essential reason of that; tax - debt, tax rate and fiscal expenditure system mechanisms cannot be effective channels transmitting fluctuation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finally, we propose that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policy should be dominate for stabilize output, and it must firstly remove obstacles in the channels for ensuring its efficient oper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f Consumption; Inventory Investment; Taxation Fluctuation; Economic Volatility